

評析德國 60 至 70 年代反權威教育下兒童商店的理念與實踐

張淑媚*

摘 要

本研究主要考察德國 60 及 70 年代反權威教育下兒童商店的理念與實踐，並對於其發展的困境以及後續的影響加以評析。

關鍵詞：反權威教育、兒童商店、心理分析教育學

*本文作者為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E-mail: shumei1967@mail.ncyu.edu.tw

壹、前言

德國 60 及 70 年代的反權威教育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對國內教育界為一塊陌生的研究領域。如果說德國 60 和 70 年代的批判教育學以及當時的反權威教育共同以追求解放為核心，批判教育學較偏重理論的探討，反權威教育可說是實踐。關於德國的批判教育學，國內有少數的引介以及反省 (張淑媚，2007；張淑媚，2008；梁福鎮，2001；馮朝霖，2002；楊深坑，1988，2002)，可惜尚無對德國的反權威教育所進行的相關研究，此為本研究的獨特之處。

然而「反權威教育」的含意卻十分籠統。它將德國 60 年代末興起的所有異質性的教育理念包含在一起，在概念分歧的狀況下只能說這些教育實踐唯一的共同點是批判權威 (Ludwig, 1997)。Dietrich (1971) 與 Masthoff (1981) 將反權威教育分為兩類：一種是重視個人的自由、自我實現以及幸福，可說是個人主義導向的，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英國興起的尼爾夏山學校為代表¹；第二類則具有政治社會意涵，以階級鬥爭的方式追求政治解放，期待能透過教育對傳統社會進行革命式的改造，在學前教育階

¹ Rowohlt 出版社 1965 年即出版了尼爾的書，從英文標題直接翻譯為《夏山學校的教育》，然而未能受到廣大注目，直到 1969 年趁著社會的反權威運動風潮將此書以《反權威教育》之名重新出版，才很快的風行，到了 1971 年已經出版到 65 萬本之多，成為廣受注目的暢銷書。請參見：Masthoff, Regine (1981).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段以兒童商店 (Kinderladen) 為代表，在中等教育階段則是以從中學生學運引發的在校內所進行的一種社會主義導向的反權威教育。

本研究將範圍界定在兒童商店的教育理念以及實踐，一來受限於研究者所能找尋到的文獻，二來中學生在校內進行的反權威教育為少數，兒童商店才是當年反權威教育的主流。至於尼爾的夏山學校，雖然在 60、70 年代流傳甚廣，但是在德國並未有實際的實踐活動，所以不列入本文範圍內。

兒童商店的理論與實踐皆將批判的焦點集中在對權威的反思，甚至認為要培養兒童的獨立自主必須去除權威，然而察考其教育實踐，卻如 Ruthe (1972) 所言，反而落入了以新權威取代舊權威的矛盾；進一步從德國教育學的發展脈絡來看，研究者認為反權威教育並未留下深遠的影響，80 年代後受到後現代思潮的衝擊，興起了另一股重視個體獨特發展的多元化教育理念。

為了證成以上兩個論點，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的方式進行。整理不同文獻描述反權威教育整體的興起背景，以此為基礎詳述兒童商店的理念以及實踐，並嘗試從不同兒童商店的運作中歸納出其共同處；其次，分析兒童商店的發展困境與沒落，最後針對兒童商店進行評析。

貳、德國反權威教育的興起背景與發展

因為兒童商店是在反權威運動的大脈絡下崛起的，以下先論述反權威運動的社會背景，再論及兒童商店興起的原因。

一、反權威運動的社會背景

根據 J. Habermas (1969) 之見，德國 60 年代的反權威運動可分為三期：第一階段是由 1965 年初到 1967 年 6 月，以大學生為主，以反越戰作為主要訴求，範圍侷限在柏林自由大學中；其次，由 1967 年中旬開始，在一場抗議伊朗獨裁者 Schah 來德訪問的活動中警方不幸開槍打死參與示威的一名學生 Benno Ohnesorg，引發全德大學生的串連。除此之外，此階段抗議的對象還包含：掌控大眾傳媒的 Springer 集團、國會準備通過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緊急狀態法」(Notstandsgesetze)、左右派政黨合組的聯合內閣。因為抗爭的對象包含德國的政治與社會範疇，因此學生組織和政治團體與工會團體結合，使得示威活動成為全國性的現象。雖然如此，國會仍在 1968 年 5 月 30 日通過「緊急狀態法」。挫敗之餘，學生將抗議主題從政治議題又轉回到大學教育本身的問題，此時進入學生運動的第三階段，以破壞性活動來阻撓學校活動的實現。

由上可見，左派學生接連以反越戰、反 Springer 集團壟斷大眾媒體、反緊急狀態法等作為訴求，從 1965-1968 年間逐步以示威抗議諸般行動挑戰社會威權。

二、反權威運動對兒童商店的影響

參與反權威運動的群眾大部分是大學生，在 1968 年 2 月西柏林科技大學召開越南研討會(Vietnamkongress)，反越戰的聲浪繼續高漲之餘，在衣物間聚集了超過 40 位以上的孩童，許多女性不想成為反越戰運動的旁觀者，於是在研討會期間組織了臨時的幼稚園，以便有孩子的女學生可以參加開會以及抗議行動(Bott, 1970 ; Masthoff, 1981 ; Rauch, 1972 ; Ruthe, 1972)。這個臨時的自救行動引發了對當時幼兒教育的後續思索。一方面當時的幼稚園太少，只能收容全西德三成左右的幼兒，導致許多婦女無法參與公領域的活動；再者，當時的幼稚園都以權威的方式帶領，強調孩童在成人的權力之下完全放棄自己隨性的需求，無條件的適應權威(Bott, 1970)，在當時反權威運動的風潮下幼兒教育的權威取向也相繼引發許多的不滿。

綜上所述，60 年代末許多大學生參與了社會的反權威運動，出於實際的托兒理由，也基於對市立幼稚園的不滿，帶動了反權威教育的實踐，企圖和當時的威權教育抗衡。

當時對於傳統權威教育不滿者承租了擱置不用的商店店面當作照顧幼童的空間，

也讓反權威教育有了「兒童商店」的通稱。雖然大多數兒童商店在 1968 年的越南研討會後設立，然而根據 Bott(1970)的資料顯示，法蘭克福在 1967 年的 9 月即成立了「應用的社會教育學協會」(Verein für angewandte Sozialpädagogik)，並以此學會之名設立了「法蘭克福兒童學校」(Kinderschule Frankfurt)。從 1967-1970 年之間，全西德大約成立了 200 間的兒童商店 (Wolff, 1970)。

參、兒童商店的理念與實踐

一、理念層面

兒童商店在運作上，不論收容兒童的年紀、團體的大小、到家長社會背景 (大部分是大學生) 皆有所不同。而在理論基礎上，成立之初主要將焦點集中在兒童中心的理念，企圖以心理分析的觀點幫助孩童拾回遺失的個人幸福，然而此種觀點漸漸受到社會主義者的質疑 (Nyssen, 1971)。有鑑於兒童商店之間彼此缺少交流以及理念協調，1968 年的 8 月 10 日在西柏林成立了兒童商店中央委員會。成立宗旨一方面是加強兒童商店之間的溝通，另一方面則是明白宣示兒童商店的實踐應以社會主義為核心，發展共同的政治行動理念 (Masthoff, 1981)。由此聲明，整個兒童商店的運作逐漸從教育層

面轉移到政治層面。1969年4月8日到12日在法蘭克福第22次「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²的代表會議更進一步的確認反權威教育的政治意涵 (Werder, 1971, 頁16):

從立場上來說，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強調勞工階級孩童的教育，所批判的是純粹將心理分析導向的教育視為個人性的、中產階級的觀點以及與之相連的特別的經濟上與精神上的知識份子的精神處境。

這段聲明批判了心理分析導向卻不重政治意涵的反權威教育，認為他們只是嘉惠從特權階級而來的孩童，卻不是為了廣大的勞工階級子女而設立的，呈顯出兒童商店運作的核心為馬克思主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兒童商店並未排拒心理分析，其理念基本上承襲自 S. Freud，然而 Freud 本人強調個人的本能慾望需受限於社會規範與文化，為了避免精神官能症的產生，需藉助教育來幫助個人修剪自身的自然本能，幫助個人適應社會 (Freud, 1933)。但是 Freud 的學生 S. Bernfeld、E. Fromm、O. Fenichel、W. Reich、V. Schmidt 以及受 Freud 影響的法蘭克福學派卻將其對社會文化的保守觀點用馬克思主義予以轉化，從中提煉出有待改變的既存社會關係，並予以批判性的分析 (Engelmeyer, 1973)。其中，最早由 Bernfeld 在 1925 年出版「薛西弗斯或教育的界限」(Sisyphos oder die Grenzen der

² SDS 是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的簡稱，1946 年成立的左派學生團體。1965 年起，主導反對國會通過「緊急狀態法」(Notstandsgesetze) 反越戰、反對伊朗獨裁者 Shah 來訪等學生運動，為 60 年代學運的重要角色，1970 年解散。請參見：http://de.wikipedia.org/wiki/Sozialistischer_Deutscher_Studentenbund

評析德國 60 至 70 年代反權威教育下兒童商店的理念與實踐

Erziehung) 一書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作為心理分析教育實踐的基礎。此書緣起於一次大戰後，Bernfeld 為戰後的孤兒在維也納設立 Baumgarten 幼稚園，在此幼稚園中他接觸到的孩童不是孤兒就是出自勞工階級，在他們身上他觀察到中產階級的文化規範對弱勢階級的壓抑與宰制，看到孩童身上所承載的社會與政治的問題，然而此書一直到了 60 年代在反權威運動之後才受到注目 (Füchtner, 1978)。

以下從家庭以及性教育兩方面論述兒童商店結合馬克思取向的心理分析所進行的社會批判：

(一) 對小家庭的批評

以 Freud 的「超我」概念來看待權威的形成，指的是父親體現了社會的外在權威，兒童則透過對父親的認同，將父親的命令與禁令用道德和權力的方式包裝，並將之內化為「超我」，作為自身行動的規準。如此一來，權威不只是以外在的方式呈現，同時也形塑了個人的人格 (Horkheimer, 1987)。將此一概念結合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所看到的是市民家庭中的父親以其財產及教育程度證成自身的權力，不斷的灌輸孩童和婦女資本主義的規範，而孩童和婦女將之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與角色認同，因而使得現存的社會不斷透過家庭予以再製，造就一個權威的、組織化的小型照

養社會 (Horkheimer, 1987 ; Ruthe, 1972)。Engelmayer (1973) 認為由此看來，孩童和婦女都是市民家庭中的受剝削者與受壓迫者的代言人，要進行家庭的徹底變革，就必須先尋求兩者的解放。

(二) 對性教育的批評

Reich、Fromm、Horkheimer 等人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出發，批判父權社會下的父親以「超我」的姿態出現，用各種規範管制孩童本我的性驅力，藉以維繫社會的威權統治。在此脈絡下，這些心理分析取向的學者將外在的社會權威連結上個人「本我—超我」的心理結構，並將壓抑的性教育解釋為整個威權體制的重要一環 (Auchter, 1973 ; Freyberg & Freyberg, 1971)。由此，Reich (1979) 認為透過個人的性解放才能顛覆社會的權威。他的目標是不受外在的性道德所影響，而是以自我管理的方式達成自然的性舒展。

綜上所述，馬克思導向的心理分析，認為整個家庭皆為資本主義的威權體系服務，不但壓抑了個人自主性，同時也對個人的本能欲力 (特別是在性驅力上) 進行壓抑，以進行道德規範上的掌控。所以欲徹底的改造社會，就得從家庭教育著手。在以上論述的脈絡下，Engelmayer (1973) 提及兒童商店欲透過反權威的教育來顛覆小家庭的形

式，實施社會主義的生活共同體 (Wohngemeinschaft)，一方面以集體形式進行孩童教育藉以脫離父權主導的家庭教育，同時讓婦女解除教養孩童的責任，得以有機會參與政治改革的活動。以下繼續從不同兒童商店的實踐面向來看其教育目標與方式。

二、實踐層面

以下從教育目標、心理分析所特別強調的性教育、生活方式及權威幾個不同層面來看幾個著名的兒童商店的教育實踐。

(一) 教育目標與方式

1967 年成立的第二公社 (Kommune 2)³提出了其反權威教育模式的構想。此一模式主要參照的是 20 年代由 V. Schmidt 以心理分析的理論在莫斯科所創辦的兒童之家 (Kinderheim Laboratorium)。此一幼稚園在當時以一種集體的、沒有壓抑的教育受到許多左派份子的推崇 (Auchter, 1973)。事實上公社的設立與生活方式可說是兒童商店的前身。透過公社本身成員的陳述可以窺知公社的生活 (Ruthe, 1972, 頁 10-11)：一群對於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厭惡者的聚集，他們感覺到自身被資本主義宰制系統中最強勢

³ 第二公社是由信奉社會主義的學生1967年在柏林所組成的生活共同體。成員有四位男性、三位女性以及兩位兒童所組成。請參考：Auchter, Th. (1973). *Zur Kritik der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Informationen, Überlegungen, Konsequenzen*. Freiburg : Lambertus-Verlag, 24.

的小市民階級家庭所壓抑，因而集結為共同的生活團體。由於公社成員中只有兩位小孩的結構，在性教育實施上的不便（在性教育的部分會再詳述）因而在 1968 年又成立了兒童共同體（Kinderkollektiv）（Auchter, 1973）。兒童共同體的教育目標遠程來說在於對抗資本主義的利益、將私有制連根拔起。透過一種和資本主義的規範完全不同的反權威教育預備孩童成為一個具有批判性以及自由意志的人，為其成人之後參與社會的革命做準備（Rauch, 1972），透過政治上的鬥爭抵抗壓迫的根源，以改變社會的關係。孩童教育的具體目標則是阻止孩童固著在幼稚的和非理性的權威之上，透過孩童集體生活的教育阻止孩童對於父母的依附，減少對於精神官能衝突的投射，追求自身的獨立性（Ruthe, 1972）。在實際的作法上，根據第二公社對兒童共同體的陳述表示（Bookhagen, 1969），他們儘量提供比現行的市民家庭更多的自由空間：儘量不要干涉孩童的遊戲，不要用購買的玩具以及用講故事的方式壓抑兒童自由遊戲的需求；在飲食習慣上，不強迫吃特定東西以及規定要吃完東西，穿著方面反對傳統社會強迫養成的整潔行為，允許孩童弄髒衣物。

1967 年在法蘭克福建立的「法蘭克福兒童商店」（Kinderschule Frankfurt，簡稱

評析德國 60 至 70 年代反權威教育下兒童商店的理念與實踐

KSF)⁴其訴求是：「以實驗的方式實現一種無壓制的教育。在壓制的社會內對抗壓制的社會，創造一種模式，在其中一種自由的、反權威的教育是可能的」(Auchter, 1973)，其中點明了施行無壓制的自由教育可培養孩童日後對抗壓抑的威權社會的能力。他們的作法和第二公社的兒童共同體雷同：在每個年紀以及每個生活領域(如飲食、睡覺、社會行為、遊玩、學習等等) 都讓孩童的需求得以自由表達以及自我管理。KSF 預備了許多活動供孩童依自己的需求和興趣選擇參與，這一方面意味著尊重孩童的需求，同時表示並不苛求孩童選擇超出自己能力範圍之外的活動(Bott, 1970)。

1968 年在南德斯圖加特成立的兒童商店(Der Kinderladen Stuttgart，簡稱 KLS) 目標較為多元。起初的成立是為了在學運期間解決婦女迫切的托嬰和育兒需求，不僅關注政治意涵的社會改造目標，同時注重促進孩童的智力、創造力以及社會化的行為這些多元目標，另外也希望促進婦女的解放(Bott, 1970)。在社會改造的目標上，他們認為不是直接傳授給兒童文化技能，而是幫助孩童克服自己對他人的攻擊欲，以及學習以合作方式共同克服衝突，培養團結一致的基本能力，以便未來能夠達成階級鬥爭的任務。另外，在孩童可理解的範圍內，讓他們了解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體制的部分

⁴ 1967 年建立，起初 5 位小孩，一年半內增長到 20 位。1969 年有 14 位孩童從 4 至 6 歲之間。請參照：Auchter, Th. (1973). *Zur Kritik der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Informationen, Überlegungen, Konsequenzen*. Freiburg : Lambertus-Verlag, 28.

精神。譬如說引導兒童穿越禁止踐踏的草坪，藉此讓他們親身體會到和權威的衝突，進一步和權威的代表者公園管理員有所討論，以便讓他們練習與壓迫的系統進行抗爭 (Bott, 1970 ; Ludwig, 1997)。

從柏林、法蘭克福以及斯圖加特等地兒童商店的運作中可以看出其將教育賦予強烈的改造社會的意涵。Zimmer (1969) 在柏林的兒童商店所發表的共同聲明中表示，反權威教育必須透過教育促進個人的解放，而個人的解放為社會解放的基礎。如此一來賦予了兒童商店在長期策略上的重大意義：它要讓個人盡可能的在人格結構上解放，就如同未實現的烏托邦在孩童身上體現一般，另一方面並非要以孩童嶄新的自我認同創造一個和現有社會不同的隔離區，而是要在搶先實現了的解放所蘊含的革命潛能中，讓成長中的孩童用相應的知識和能力，不斷嘗試去排除所有阻礙他們自我認同實現的障礙、強迫以及體制化的壓迫。明顯可見，這些兒童商店，不再將教育視為促進個人發展的私人任務，而是推動長期社會改造的社會任務。

(二) 在性教育方面

在第二公社設立的「兒童共同體」中，他們不再如小市民階級的家庭一般容忍孩童的性行為，相反地是積極的肯定「性」，積極而肯定孩童的性行為是其教育重點。他

們接納 Reich 的性觀念，認為要積極促進三四歲的孩童應該彼此撫摸相互自慰的行為。然而，在鼓勵孩童發展性的興趣之餘，不免他們也會對成人的生殖器感到興趣。在此就顯現了自由教育的界線，公社對此的態度是讓成人的心理障礙為孩童的性好奇設限。根據第二公社自身的紀錄顯示，孩童的性興趣並不受成人的威脅和禁令所嚇阻，甚至會模仿成人的性行為，因而他們認為讓孩童認識到其對生殖部分的興趣不能經由成人滿足，就現實上來說只能和同儕之間進行是十分重要的 (Auchter, 1973)。

法蘭克福的兒童商店 (KSF) 提出對孩童性教育的原則 (Auchter, 1973)：

a. 避免個別的孩童將性需求固著在個別的成人身上，反之亦然；b. 促進團體學習的過程，讓孩童也學習處理除了性之外的需求。

在性自由方面，兒童共同體強調積極的性自由，KSF 的作法則是用團體學習的過程，以轉移過多對性驅力的關注與固著。

(三) 對教育者的要求

要打破市民社會的小家庭的壓抑機制，這樣的難題不是光從理性的層面檢視就可以改變或是打破的，必須從教育者身上先行改變 (Ruthe, 1972)。

第二公社的兒童共同體這方面在做法上，透過父母輪班照顧不同小孩，使得父母

逐漸不習慣將自己的小孩如同以往一般的看待，慢慢會落入一種強迫性的中立態度，對待自己的小孩如同其他的小孩一般，讓父母成為「中立的重要他人 (neutrale Bezugsperson)」(Bookhagen, 1969)。

KSF 對教育者的要求較為嚴格，希望藉由教育者的自我不斷省思作為教育孩童的基礎。父母和中立的教育人員一至兩星期換班一次輪流照顧孩童，他們也必須學習掌握自己已經意識到和未意識到的問題並且一起處理和予以解決。具體來說，成人必須嘗試，從自傳的以及整體社會脈絡的複雜性去理解自身在性方面的困難，並且進行分析，這同時意味著：他們必須將自身的問題在政治脈絡中進行集體的處理；他們也必須相對化他們對孩童的關係。亦即消解他們對孩童的固著態度，藉此阻止孩童對成人權威的固著，以及阻止成人將他們的性問題轉移到孩童身上 (Bott, 1970)。

不論是透過輪班照顧孩童減低重要他人對孩童的影響，還是對父母教師進行心理分析的解析與再教育，皆是期盼透過教育者在理解並解決自身心理問題的狀況下進一步有能力幫助孩童面對與處理其心理問題。

肆、兒童商店的發展困境與沒落

評析德國 60 至 70 年代反權威教育下兒童商店的理念與實踐

這類對抗威權社會以及教育的實踐引發了兩極化的評價。保守的 Springer 媒體集團 1969 年在他們出版的「柏林晨報」上憂心忡忡的表示 (Berliner Morgenpost, 1969 ; Wolff, 1970) : 這種教育方式預設了孩童只有在不用聽話、只依自己的意願生活才是幸福的。可是當我們放任孩童在反權威教育的幼稚園中，只是容讓他們作亂而已；德國兒童保護聯盟的主席 Walter Becker 博士也非常擔憂反權威教育的發展，他強力反對全面的縱容孩童，而且呼籲家長要抵制此種教育的錯誤形式，千萬不要把小孩送去這類幼稚園，避免這些孩童被不當的複製 (Frankfurter Rundschau, 1970 ; Wolff, 1970)。

儘管批評聲浪不斷，然而卻也有學者、特別是主張心理分析的學者認為公立幼稚園品質不佳，新進興起的兒童商店代表教育充滿希望的新走向，在其中許多父母和教育者一起討論教育的問題，孩童可以自由的活動，他們的需求在此也會受到關注 (Behncke, 1972)。可見對於左派導向的兒童商店評價不一，爭議頗大。

客觀地就其存在的時間來看，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兒童商店的運作就已經沒入尾聲 (Hentig, 1993)。Harress (1987) 所下的結論是：兒童商店的運作大體而言已經失敗了，因為它註定失敗。其實成效不彰主要和未獲補助經費不足、只有學前教育階段成效無法延伸、兒童商店之間彼此缺乏協調等等組織上的問題有關 (Masthoff, 1981 ;

Rauch, 1972)。

除此之外，值得深思的是在反權威的教育中真的去除權威了嗎？觀察了公社中的父母對於孩童不加管制的性自由之後，一位在 Giessen 心理創傷醫院中工作的心理分析師 Dr. H. Junker 表示：這些孩童被促進的性自由，看起來比較像是他們父母在滿足自己從小未被滿足的性本能而已 (Ruthe, 1972)。在反權威教育中被視為經典的 Reich 認為性本能應不加壓抑的開展。這點值得深思，性作為一種本能和權力、飢餓、佔有等本能並列。大家會同意權力本能必須加以管制，不然淪為霸道以及暴力的使用；而飢餓本能所驅動的如食慾也必須適可而止，過多的進食只會傷身；至於佔有慾也是一樣，無限擴張下只是和整個社群敵對。而為何獨獨性本能必須予以保障，得以不受壓抑、不受強制的舒展？這點 Reich 無法自圓其說，而反權威教育者也是不經反省的全盤接收了這些心理分析的思想 (Ruthe, 1972)，將之視為權威予以接受。

另外，在促進婦女的解放方面：根據紐倫堡兒童商店的參與者之一 Brigitte 在 1970 年的反省 (Kinderladenkollektiv I, 1970)，只有週一到週六每天上午三個小時的時間無法促成婦女參與生產工作；其次，在兒童商店中存在太多的壓抑機制，婦女對於男性的控制還是逆來順受，甚至當她建議女性跟男性分開，相互溝通彼此共有的問題，相

互團結起來處理問題，仍受到許多婦女的反對，甚至 Brigitte 也自承在寫作此文時心理仍免不了被男性批判的焦慮，關於男性在社會文化中的權威仍然難以去除。

如果男性的權威以及心理分析的權威仍在，那我們繼續分析反權威教育的目標：在社會主義的引導下，反權威教育要培養出一群「新人類」，透過新人類創造新社會。培養新人類是新社會中政治教育的任務，以反權威教育作為工具。在教育方式上，反對既有資本主義社會整潔、紀律等價值規範，提供孩童各個生活領域上的自由。然而弔詭的是，當兒童商店一直極力抵抗權威之時，卻又未經反省的接受 Reich、Horkheimer 等人的思想，將他們視為宣告未來幸福的真理，如此一來他們只是以新的權威來取代舊權威而已，在尚未解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強迫與壓榨之時，就以更嚴苛的強迫取代了資本主義 (Ruthe, 1972)。對此，Marcuse (1967) 則是認為，為了解放後美麗的新人類以及新社會，忍受另一種新的權威是必要的，因為新社會的建立與維持，需要透過中央的權威維持社會控制。如此一來，弔詭的是既然要求孩童的獨立自主卻又強調對解放後新權威的服從，結果卻以集體的政治觀點限制了個人獨立自主的發展。

如此一來，顯示兒童商店所宣稱的社會革命與解放，卻無法在理論基礎上和個人的獨立與幸福並存。如前所言，Freud 的心理分析為了追求個人的幸福所強調的是適應

既存的社會規範與文化。但是後來轉向了和社會主義的結合，強調反抗社會追求社會解放的相反道路。如此一來在作法上勢必陷入矛盾：到底以適應環境免除個人焦慮，追求個人幸福為主？還是堅持和不公義的環境對抗，追求社會的解放？批判教育學者 Giesecke (1972) 批評了心理分析的這種矛盾：他認為如果個人的對抗行為長久不受到社會支持或重視的話，只會使這個挑釁和叛逆的行為成為人格上長期的挫敗，使得挑釁者被社會所孤立，陷入更大的焦慮，無法達成追求個人幸福與獨立的目的。一位參與法蘭克福兒童商店的老師 Nyssen (1971) 對此也有深入的反省。從幼兒心理健康的觀點來看，當他們在店裡接受到了社會主義的觀點，面對其他資本主義的領域中價值系統的衝突，容易導致他們心理的衝突與焦慮。Giesecke (1972) 也反省過此種過早將教育予以政治化的問題：不同的年齡層有不同的了解政治議題的方式以及政治對不同年紀的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意義。面對年紀小的孩童時，教導其質疑自身的社會脈絡，只會導致他們內在的不安、無法融入社會而已，因為他們尚未有能力和原生的階級保持距離，也無法採取行動與之對抗。對他們而言，認同比批判自己的階級更具有存在上的意義。

綜合而論，在教育上無法真正破除權威，而且落入以新權威取代舊權威的矛盾中，

顯示了兒童商店在實踐上甚難突破的困境。

伍、小結

如上所述，反權威教育在受限於諸多困境而沒落。然而它到底有沒有留下什麼後續的影響？關於這方面有不同的見解。März (1993) 認為反權威教育歷經近 10 年的騷動後，一切又重歸平靜。Ludwig (1997) 提及相關文獻在 80 年代之後寥寥可數，不過他 (Ludwig, 1997) 認為從教育理論的延續發展上，依然可以看到反權威教育的影響，不管是教育上尊重學生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還是 Braunmühl(1975) 所主張的「反教育學」(Antipädagogik) 都可視為反權威教育的延續；而根據 Schröer (2005) 所言，兒童商店將兒童視為教育中的主體，把兒童提升為教育過程中的對等夥伴，此一觀點至今仍對立於傳統的幼兒教育，可藉以省思傳統教育。

綜上所述，兒童商店作為對德國 60 及 70 年代威權體制的挑釁而崛起，然而可惜在實施上有經費不足、只有學前教育成效無法延伸、彼此缺乏協調等等組織上的問題，另外在理論上，其被馬克思主義走向的心理分析所主導陷入以新權威取代舊權威的問題，這些實踐與理論上的缺失都使得短短不到 10 年的時間兒童商店的風潮逐漸消退。

然而，其卻影響了 70 年代後將學生視為主體、尊重學生教育民主化的改革。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張淑媚 (2007)。評析德國教育學者 Hermann Giesecke 批判取向的政治教學理論。《課程與教學季刊》，10 (2)，1-16。

張淑媚 (2008)。評析德國教育學者 K. Mollenhauer (1928-1998) 的批判教育學思想，《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 (1)，129-150。

梁福鎮 (2001)。《審美教育學：審美教育起源、演變與內涵的探究》。台北：五南。

馮朝霖 (2002)。《教育哲學專論。主體、情性與創化》。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楊深坑 (1988)。《理論、詮釋與實踐》。台北：師大書苑。

楊深坑 (2002)。《科學理論與教育學發展》。台北：心理。

外文部分

Auchter, Th. (1973). *Zur Kritik der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Informationen, Überlegungen, Konsequenzen*. Freiburg : Lambertus-Verlag.

Bernfeld, S.(1969). *Sisyphos oder die Grenzen der Erziehung*. Frankfurt am Main: März

- Verla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5)
- Bookhagen, C. (1969). *Kommune 2 – Versuch der Revolution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Individuum*.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 Bott, G. (eds.)(1970). *Erziehung zum Ungehorsam. Kinderläden berichten aus der Praxis der antiautoritären Erziehung*. Frankfurt: März Verlag.
- Braunmühl, E. v. (1975). *Antipädagogik*. Weinheim: Juventa.
- Dietrich, T.(1971).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ein Widerspruch in sich? *Lebendige Schule*, 26(3), 87-93.
- Engelmeyer, O.(eds.) (1973). *Antiautoritätsdiskussion in der Pädagogik. Quellentexte, Kommentare, Analysen*. Neuburgweier/Karlsruhe: G. Schindele Verlag.
- Freud, S.(1933).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34.Vorlesung*. Werke Band XV.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536-539.
- Freyberg, D. v./Freyberg, T. v. (1971). *Zur Kritik der Sexualerziehung*.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Füchtner, H. (1978). Psychoanalytische Pädagogik - Über das Verschwinden einer Wissenschaft und die Folgen. *Psyche*, 3, 193-210.
- Habermas, J. (1969). *Protest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Hentig, H.v. (1993). *Die Schule neu denken*. München/Wien: Juventa.
- Horkheimer, M./Fromm, E./Marcuse, H.(1987).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Lüneberg: Dietrich zu Klampen Verlag. (original ausgedruckt 1936)
- Kinderladenkollektiv I (1970). Emanzipation der Frau durch den Kinderladen. In H.-Werner Sass(eds.)(1972) :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oder die Erziehung der Erzieher* (pp. 189-190). Stuttgart: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 Ludwig, P. (eds.)(1997). *Summerhill : Antiautoritäre Pädagogik heute—Ist die freie Erziehung tatsächlich gescheitert?* Weinheim und Basel: Beltz Verlag.
- Marcuse, H. (1967).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Neuwied-Berl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 März, F. (1993). Macht oder Ohnmacht des Erziehers? Von pädagogischen Optimisten, Pessimisten, Realisten. Bad Heilbrunn : Klinkhardt.
- Masthoff, R. (1981).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Nyssen, F. (1971). Politische Erziehung im Vorschulalter . Ein Papier aus der Kinderladen – Arbeit in Frankfurt/Main. In H.-Werner Sass (eds.)(1972) :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oder die Erziehung der Erzieher* (pp. 211-220). Stuttgart: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 Rauch, E./Anzinger, W. (1972). *Wörterbuch kritische Erziehung*. Starnberg: Werner Raith Verlag.
- Reich, W. (1979). *Die sexuell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1)
- Ruthe, R. (1972). *Pro und contra zur nicht-autoritären Erziehung*. München: Juventa.
- Schröder, W. (eds.)(2005). *Handbuch Kinder-und Jugendhilfe*. München/Wien: Juventa.
- Werder, L. v. (1971). *Von der antiautoritären zur proletarischen Erzie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Wolff, R. (1970). Erziehung ohne Zwang? Über einige Grundfragen der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In H.-Werner Sass(eds.)(1972) :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oder die Erziehung der Erzieher* (pp. 202-210). Stuttgart: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 Zimmer, J. (1969).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 Theoretische Konzeptionen und Standortbestimmungen 1. Berlin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In H.-Werner Sass(eds.)(1972) :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oder die Erziehung der Erzieher* (pp. 191-192). Stuttgart: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文稿收件：2010年07月06日

文稿修改：2010年08月20日

接受刊登：2010年09月20日

Research on Children Shop under Anti-authority Pedagogy in German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hu-Mei Chang *

Abstract

The study examines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ldren shop under anti-authority pedagogy in German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By looking at th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in its practices, the study further addresses the question and meaning concerning the context of German pedagogy.

Keywords: anti-authority pedagogy, children shop, psycho-analytical pedagog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 shumei1967@mail.ncyu.edu.tw